

分类号：I206.7

学校单位代码：10446

曲阜师范大学

硕士学位论文

论文题目： 不一样的伊甸园

——论当代小说中的同性恋书写

研究生姓名： 邢 琼

学 科、专 业： 中 国 现 当 代 文 学

研 究 方 向： 中国当代文学

导师姓名、职称： 张文娟 副教授

论文完成时间： 2 0 1 3 年 4 月

曲阜师范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原创性说明

（根据学位论文类型相应地在“□”划“√”）

本人郑重声明：此处所提交的博士□/硕士☒论文《不一样的伊甸园——论当代小说中的同性恋书写》，是本人在导师指导下，在曲阜师范大学攻读博士□/硕士□学位期间独立进行研究工作所取得的成果。论文中除注明部分外不包含他人已经发表或撰写的研究成果。对本文的研究工作做出重要贡献的个人和集体，均已在文中以明确的方式注明。本声明的法律结果将完全由本人承担。

作者签名：

日期：

曲阜师范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使用授权书

（根据学位论文类型相应地在“□”划“√”）

《不一样的伊甸园——论当代小说中的同性恋书写》系本人在曲阜师范大学攻读博士□/硕士☒学位期间，在导师指导下完成的博士□/硕士☒学位论文。本论文的研究成果归曲阜师范大学所有，本论文的研究内容不得以其他单位的名义发表。本人完全了解曲阜师范大学关于保存、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同意学校保留并向有关部门送交论文的复印件和电子版本，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本人授权曲阜师范大学，可以采用影印或其他复制手段保存论文，可以公开发表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

作者签名：

日期：

导师签名：

日期：

摘要

同性恋现象是一种特殊的自然和文化现象，而关于同性恋现象的文学书写也是一种比较边缘化的存在。虽然我国文学史中对这种文学书写从未专门分类提起，但这种独特的叙事题材却一直存在于文学历史的长河当中，由此也可以看出，这种现象的存在是不容忽视的，也引起了社会各界不少学者的注意。世界文学史上描写同性恋的作品有不少，我国文学历史中涉及同性恋现象的创作也并不少见，尤其是进入现代以后，该方面的作品数量也不容小觑：从五四时期郁达夫、庐隐、凌淑华等一批作家的创作开始，到台湾的白先勇、邱妙津等作家，再到后来的陈染、林白，以及进入 21 世纪以后创作力日益旺盛的作家严歌苓、崔子恩等人，这一大批作家都为同性恋文学创作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他们创作的同性恋小说也在一定意义上引领人们去认识、以及客观地去看这一现象。文学作品反映着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因此文学领域对同性恋现象的书写也代表着社会对这一现象的关注度，体现了现代社会对这一现象的包容度有了很大提高。

本文通过聚焦新时期以来当代作家们所创作的同性恋题材的小说，对作品中庙会的同性恋状态以及作家们的切入角度进行了认真梳理和细致分析，由此发现：不同时代的作家对同性恋现象有着不同的解读，而在小说中对此现象的书写也有着不同的主题：有的描写从抵御外界寒冷而结成的女性同盟中诞生的同性之爱；有的关注同性恋者从最初的无法面对自己的身份到自我解放的实现；还有的作品描述同性恋者在自我认同之后无法直面的现实生存。并且，无论是关注同性恋人群的哪种状态，作家们都着力于对这些人物精神层面的挖掘和描写，还原给我们一个不一样的伊甸园——一个真实的同性恋世界。在此基础上，本文又进一步探究了作家们进行此类创作的动因以及蕴含的文化内涵：对传统的性观念以及偏枯的性别文化进行了反叛，并指向深层的人文关怀。由此，本文又分析了当代同性恋题材小说的意义，认为它具有文学和现实两方面的积极意义：此类小说创作大大丰富了当代文学的类型，打破了异性恋书写一统天下的局面，对其进行了开拓与创新；而此类书写中通过对同性恋者比常人更为复杂的内心活动的描写，探索了人本身所面临的生存与情感困境，加深了人对自身的了解，也提升了文学的品质；另外，此类小说的创作对于引领人们正确认识和看待同性恋现象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当代同性恋小说创作必将在文学史上留下属于自己独有的印记。

关键词：同性恋书写；创作动因；文化内涵；意义

Abstract

Homosexuality is a special kind of cultural phenomenon, the homosexuality phenomenon of the existence of literature writing is also a kind of comparative marginalization. Although in our country history of literature to the literature writing has never specifically classified filed, but the unique narrative subject has been in literature history, it also can be seen that the existence of this phenomenon cannot be ignored, also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of many scholars from all walks of life. About ancient and modern, Chinese and foreign works has many gay, after entering the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aspects of the work and the number to be reckoned with: in the May 4th period, Yu Dafu, Lu Yin, Ling Shu Hua a batch of writer's creation, to Taiwan, the Qiu Miaojin writer Bai Xianyong, Chen Ran's later, Charles Lindbergh, again after entering the 21st century, as well as emerging writer Yan Geling, Cui Zhen, such as people, a large number of writers have made indelible contribution for gay literature creation, they created the homosexual novels in some sense also lead people to know, and objective look at this phenomenon. Literary works reflects the certain social ideology, so literary writing on the phenomenon of gay also represents the social awareness of this phenomenon, it also embodies the modern society of inclusion degree had the very big improvement.

In this paper, by focusing on contemporary writers since the creation in the new period of the gay romance novels, temple fair state of gay in the works as well as writers of comb Angle, has carried on the earnest and meticulous analysis, found that different writers of the era of the homosexuality phenomenon has a different interpretation, and in the fiction's writing also has a different theme: some description from against the cold outside and women formed a union was born gay's love; Some attention gay from initial could not face their own identity to the realization of the self liberation; And after gay identity descriptions in his writings can't face to face with the reality of survival. And, both focus on gay people what kind of state, the writers are focused on the mental level of mining and its characters, reduction to give us a different kind of garden of Eden - a true gay world. On this basis, this paper further explores the writers to create such motivations and contains the cultural connotation: the traditional sexual mores, as well as the gender culture of hemiplegia rebelled, and point to the deep humane concern. As a result, the article analyzes the significance of contemporary gay romance novels, thinks it has the two aspects of literature and reality of positive significance: this kind of novel creation greatly

enriched the types of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breaking the heterosexual writing the situation of unify the whole country, to the pioneering and innovative; And such writing through the gay is more complex than normal heart activity description, to explore the survival and the emotional dilemma faced by human being itself, deepened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ir own, als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terature; In addition, the creation of such novels for leading the people to the correct understanding and view homosexuality is also play a positive role, with strong practical significance. Will be left in the history of literature of contemporary gay novels belong to its own mark.

Key words: homosexual writing; Writing motivation; Cultural connotation; meaning

目 录

一、导论.....	1
二、当代小说中的同性恋现象书写.....	2
1、温暖的女性同盟.....	3
2、黑暗国度中的“孽子”与“荒人”.....	6
3、依然行走在“生活的冻土”上.....	10
三、当代同性恋文本的创作动因及其文化内涵.....	12
1、对传统性别文化的反叛.....	12
2、对传统性观念的颠覆.....	14
3、指向深层的人文关怀.....	16
四、当代同性恋文学书写的意义.....	19
1、对个体生存困境的探索.....	19
2、对异性恋书写传统的突围与开拓.....	21
3、引领人们正确认识同性恋现象.....	23
五、结语.....	25
参考文献.....	27
在校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29
致谢.....	30

不一样的伊甸园

——论当代小说中的同性恋书写

一、导论

关于“同性恋”现象与概念，社会学家李银河博士在她的《同性恋亚文化》一书中这样描述：“同性恋这一性取向是指以同性为对象的性爱倾向与行为；同性恋者则是以同性为性爱对象的个人（男人或女人）。虽然同性恋现象古已有之，但同性恋这一概念却是晚近才出现的。随着 19 世纪对人类个性发展与人类性行为研究的开展，人们才开始了对同性恋现象的研究，同性恋这一概念也得以提出。现在普遍采用的同性恋一词，英文写作 homosexuality。Homo 这一词根的本意是希腊文‘同样’之意，而非拉丁文‘人’之意。”^[1]

在我国历史上，正史和野史中都有关于同性恋现象的大量记载，更有“余桃”（春秋）、“断袖”（汉代）、龙阳君（战国）、安陵君（战国）等典故和人物的记载。“潘光旦先生曾遍查史书，考出‘前汉一代几乎每个皇帝都有个把同性恋对象’这一史实。”^[1]“近代我国称同性恋风气为‘男风’，又称‘南风’，因为这一风气‘闽广两越尤甚’。男同性恋者称契哥契弟，女同性恋者则结拜金兰。”^[2]与此同时，历史上关于描述同性恋现象的文学作品也并不少见，如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阮籍的《咏怀诗》第十一首，明代晚期的《弁而钗》，清代的《品花宝鉴》、《红楼梦》、《金瓶梅》等都对这一社会现象进行了文学性的书写。

20 世纪以来，随着现代文明的发展，同性恋文学叙事更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中一道不可忽略的风景。从“五四”时期开始，同性恋文学叙事就登上了现代文学的舞台，并且比较集中地出现了一批作品，如庐隐的《丽石的日记》，凌叔华的《说有这么一回事》，郁达夫的《她是一个弱女子》、《茫茫夜》，丁玲的《暑假中》等。这是由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们原来秉持的传统文化，打开了作家们的视野，加之当时“狂飙突进”的文风也促使作家们开始探寻一块新的表现人性的领域。这些开放的时代背景就使得同性恋文学创作成为了一些作家笔下的新宠儿。但这也只是昙花一现，接下来抗战的大规模爆发使“救亡”成为时代的核心诉求，人们对情爱问题的探讨热情相应减弱。所以，在现代文学发展史上，关于同性恋的文学叙事只是在异性恋叙事模式的遮蔽下微微探出了头，还处于边缘叙事的状态。在这些同性叙事里，故事人物一般都是被幽囚在一个封闭的环境之内，各种同性之爱往往是四面楚歌，以失败作结，从侧面说明了主流文化霸权的强大，任何的边缘文化都要被遮蔽掉。建国后，由于政治、社会发展的客观限制，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的创作主要围绕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时代重大主题展开，同性恋这

样的题材只能成为文学书写中的“禁区”。所以，从历史发展来看，异性恋话语是占主流地位的，具有不可撼动的绝对优势，同性恋叙事只是一个边缘性的亚文化现象，其所蕴含的文化与审美内涵都得不到应有的彰显。

同性恋问题再度受到国人的关注是拨乱反正、解放思想的新时期——八十年代，并一直延续至今。随着社会文化的日趋多元，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在不断更新，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边缘人群和边缘文化，相应地，在文学领域越来越多的作家也开始大胆并深入挖掘同性恋题材，如陈染、林白、王小波等作家的一些创作，描写同性爱情的作品逐渐“浮出了水面”，被人们正视。另外，创作出同性恋文本的作家有些自身就是同性恋者，如著名作家白先勇，其反映男同性恋生活的长篇小说《孽子》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另外，台湾女作家邱妙津创作的小说《鳄鱼手记》，以描述女同性恋者在生活中所面临的心理困惑与挣扎为主，并且这部小说还采用了第一人称自叙的书写方式，显示了作家的过人勇气。当代大陆作家崔子恩更以一个公开的、极端自恋的同性恋者的身份，创作了小说《我爱史大勃》、《桃色嘴唇》等。海外华人女作家严歌苓也把探究的笔触伸入这一领域，进行了一系列同性恋文学的创作。1996年同性恋短篇小说集《他她她的故事》在香港出版，收录了大陆及港台作家的较有影响的一批作品，对这一领域的创作成绩进行了集中展示。由此可见，同性恋文学书写已经构成了当代文学中一个不能忽视的、颇有研究价值的组成部分。

通过以上介绍，我们可以看到，进入当代以后，有几个阶段由于历史条件和政治因素的限制，同性恋小说书写现象并不是一直持续存在的，出现了断断续续的现象。因此本文主要选取了大陆八十年代以来创作相对集中的当代同性恋小说作品，以及在台湾同性恋创作领域具有代表性的作家较早的一些作品，试图通过这些作品梳理其描写的同性恋现象，考察新时期以来中国社会对这一问题的认知观念的流变；同时还要把握当代同性恋文学的独特风貌，探讨作家创作的动因和人文内涵，并阐释这一独特文学现象书写的文学意义以及现实意义。

二、当代小说中的同性恋现象书写

“同性恋”这一名词是伴随着人类社会工业化才逐渐出现的，在此之前即使是在西方社会，公众对这类名词还是比较陌生的，例如现在被广泛使用的特指男同性恋的词语“gay”，美国作家唐纳德·科里在他1951年出版的《同性恋在美国》一书中曾这样介绍，在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除了警察和戏剧界等少数人以外，这个词在同性恋圈子外面基本还是无人知晓”。而在我国当代文化中，广泛流行的指代同性恋者的“同志”一词也是在20世纪90年代的香港才出现的。虽然我们对这类现象认识较晚，但据社会学、历史学等学科的研究表明，同性恋这一文化现象是自古就有的，例如玛雅文明对同性恋现象采取宽容的态度，古希腊人认为男性之间的性行为是格外神圣的，大洋洲的少数民族部落还把同性性行为做为男子的成年礼仪式。在中国也不例外，我国历朝历代都有对同性恋典故和人物的记载。既然同性恋现象存在于古今中外的各个时期，那么对这一现象的文学书写

便也是自然而然发生的了。我国古代就有诗人、小说家等对同性恋现象进行了大量的文学创作，早在《诗经》当中就有了对同性爱朦胧的描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阮籍的《咏怀诗》第十一首，就对龙阳君和安陵君的同性爱情进行了美好歌颂；同时期《世说新语》当中的“品藻第九”和“容止第十四”两卷都有对柔美男子的各种描述；明代的冯梦龙专门做了几套同性恋散曲收录在《太霞新奏》当中；清代更是有多部小说名著涉及到甚至是专门描写同性恋现象，如小说《子不语》、《红楼梦》、《金瓶梅》、《品花宝鉴》等等。进入现代以后，同性恋现象的书写经历了复杂而曲折的过程，“五四”时期以人为本的观念为这一书写提供了契机与保障，同性恋书写成为五四文学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但此时期的文学主要被用来否定和批判封建思想制度及体系、提倡人的个性与思想解放，三十年代以后又肩负着保家救国的沉重使命，着力反对外来侵略、追求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在此过程中，同性恋题材的作品因过于边缘化逐渐减少，并在建国前后终至销声匿迹，直到八、九十年代大陆同性恋文学才再次出现和逐渐增多，倒是台湾文学中从七十年代开始就出现了以白先勇先生为代表的同性恋创作高潮。

当代描写同性恋现象的作品数量众多，并且不同时期不同处境的作家们对这一现象的关注角度和表现侧重有所不同，正是这些差异给读者们展示了多元而真实的同性恋生活圈，为社会了解这个圈子和探究这个人群的心理状态提供了有益借鉴，同时也拓宽了当代文学的表现领域。下面笔者将对当代小说中的同性恋现象书写做一个大致的分类及剖析，希望能够藉此展现这类作品较为清晰的书写面貌。

1、温暖的女性同盟

20 世纪 90 年代，中国女性文学得到了较大发展，而其中陈染、林白的创作无疑非常引人注目。陈染在 1995 年发表了长篇小说代表作《私人生活》，引起了文学界广泛的关注，她对女性生理以及心理活动的细腻描述引起了不少女性的共鸣。而作为同时期的女作家林白，经常以“回忆”的叙事方式对女性个人体验进行极端化的描述，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女性意识。与此同时，这两位女性文学的代表作家，也不约而同地在创作中涉及了对女同性恋爱的描述，这一点引起了不少学者们的注意。

细致梳理陈染、林白的相关作品会发现，虽然二人对同性之爱的具体书写存在一定的差异，但总的倾向大体一致：大多描绘了女性在经历了男性的伤害后在同性身上寻找温暖，从而结成同盟，一起来对抗传统性别秩序加于女性的规范，如《空心人诞生》中的黑衣女人（苗阿姨）和紫衣女人（妈妈），《猫的激情时代》中的“我”与猫，林白《回廊之椅》中的朱凉和七叶等等。这些不同时代、不同故事中的女人却有着相同的命运，她们多多少少的都被男人们伤害过，被父权社会抛弃过和无视过，她们找不到生活的出路，只能在同性身上寻求心灵的温暖与安抚。《回廊之椅》的开篇，使女七叶在介绍朱凉年轻时候的照片时，“声音充满了无限的怀旧和眷恋之意，就像一个垂暮之年的老人怀念他年轻时代刻骨铭心的爱情，这爱情是如此美好又如此富有悲剧性，使人至死不忘。”^[3]这样的语句暗示

出七叶与朱凉之间存在一种近乎爱情的关系，但文中对她们的感情描写极为隐晦，只有在七叶为朱凉洗澡的时候的亲密，才“使我们很容易想到某个在西方通行的合法的词汇”，^[4]年老的七叶回忆朱凉时脸上体现出的动人的神情和用怀念旧情人的语调说话时，才让人隐约感觉到她们之间与众不同的关系。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年轻的七叶和朱凉相处时的样子，那是男人们无法介入的世界，无论是章孟达还是陈农。作为三太太的朱凉，章孟达对其只是占有，并不关心她心里的所思所想，清高的朱凉也很少开口和他说话。而卑鄙的审讯科长陈农批斗章孟达的一个见不得人的目的也是占有朱凉，朱凉生活在男人们的居心叵测之中，这样迫使她只能和自己的使女七叶越来越亲密和愿意彼此交心。全文并没有直接的去反叛男性，但整部作品的基调却是在男权社会的压迫下朱凉与七叶产生感情的全过程，寻求同性精神以及身体的安抚是朱凉感情出发的目的。

在《猫的激情时代》中，“猫”对“我”的感情之深可能是异性无法企及的高度，“猫”为了“我”的工作去找车间主任陪他睡觉，这一举动深深震动了“我”。文中没有过多的文字描写猫的感情状况，只是细细讲述了“猫”为了“我”而进行的活动，似乎是平淡的叙述，但其中却隐藏着“猫”对“我”深深的感情。“猫”对车间主任的杀害也隐喻了女性对于男权的反叛与颠覆。小说结局是“我”和“猫”一起离开人世，这似乎也告诉读者：两个女人一起去了她们在现实中无法得到的别样的伊甸园，即女性之间温暖与爱的同盟。有学者这样写道：“同性恋是一种颠覆男权社会文化秩序的方式，女性以同性恋方式拒绝成为男人的贸易商品，正如商品拒绝进入市场。”^[5]这篇小说中“我”和“猫”的感情正是“拒绝成为男人贸易商品”的最为直接的体现。故事中的主人公大多数都是站在女性的立场上，审视女性自我与外部世界(男权中心社会)的关系，以及以女性的眼光看待女性自我也就是女人的内部世界。她们笔下的女性之间的互相欣赏已经完全忽略了彼此的生理性别，她们互相关心彼此的家庭处境、社会处境，甚至可以说，她们之间的爱慕是站在同情的基础之上的。她们之间的付出同样令人感动，为了让对方能够在男权社会中得到公平的待遇、正常的生活，她们不惜付出一切，包括自己的身体，这一点在《猫的激情时代》中的“猫”身上体现无遗。

此外，这两位女作家也借由对同性之爱的描写，来表达自我最内在的女性经验，并以此来反思女性的处境和地位。陈染在涉及同性之爱的几部作品当中都进行了详尽的感情倾诉，深入到女性被压抑和被忽视的性别经验内部，去捕捉那种异常复杂微妙和难以言表的幽暗世界。在《另一只耳朵的敲击声》一文中，黛二生活在母亲常年的监视、窥探与自身对母亲的内疚之中，心情十分抑郁。在这种压抑的生活情境里，她遇到了同公寓的伊堕人，“我寻找伊堕人，已有多多年。她正是夜梦中把我从母亲用黑布蒙头对我进行的爱的考验中解救出来的女人！只有这个女人，能够在我母亲顽强不息、亘古如斯的雕刻中，在我被爱的刻刀雕塑成石头人像之前，用她母性的手笔，把我拉救出来！我多么需要她，需要这个女人！因为没有一个人肯于并且有能力把我拉走。”^[6]这番表白深刻地剖析了黛二孤独内心的强烈需求，她很清楚自己在男人眼中只是外貌的美丽而已，而伊堕人的眼可以“一层

层剥开我的伪装、矫饰和怪癖，像上帝那样轻轻地贴近我的内心”。^[7]可以说，是伊堕人把黛二从母亲给予的压抑的爱、黛二自身的迷茫当中拯救了出来，这是任何一个男人都无法给予的力量。因此这个文本颠覆的不仅是男权，也包括“母爱”——长辈以关爱晚辈为借口进而去控制她们的生活，令她们无处遁形。在这个意义上，同性爱的含义被无限的扩大了，她们在不知不觉中结成了一种联盟，彼此拯救对方脱离长辈、异性的无形压迫，寻找灵魂的真正自由。

而林白的创作更为直接，她的作品中完全解构了以男性为中心的传统构架，男性形象大多被虚化，成为作品中的“配角”，女人们之间的感情成了她作品中主要的表现对象。这种特点使其作品成为一种对男权社会的无声抗诉，颠覆了人们一直以来信奉的女性要以男性为主导的传统观念。《瓶中之水》中的意萍对二帕是所谓的一见钟情类型，意萍在宾馆大厅里等候朋友时对从电梯里走出的二帕目不转睛，她一语惊人：“我要等的正是她”。^[8]不过，与其说她是一见钟情，不如说意萍爱上的是她自己，是和自己一样的同性。“二帕对我的意义我至今仍不十分明了，我坐在大厅角落的沙发上，隔着茶色玻璃看到的也许正是自己，只有我才会对二帕如此珍惜，如此充满激情。”^[9]而二帕是一个性格孤僻的人，“二帕在一个冷漠的环境中长大，最怕别人对自己好，惟有别人对她淡淡的，她才感到自如，才能凛然而安详地过自己的日子。”“她从来只有一个世界，这个世界坚硬如铁，连她的生身母亲也难以进入。”^[10]孤僻、自卑、敏感的二帕遇到了热情似火的意萍自然是毫无抵挡之力。两个人一开始是最为知心的朋友，因为同性之间的相通和理解，两个人都给了对方很多帮助。意萍为了二帕去争取新闻版面，“脸上是一色的悲壮”。^[11]如果说二帕在发现自己爱不上异性的时候还“不想病态，我想健康一点。”^[12]，意萍就给出了最为直接的回答：“二帕，你想到哪里去了，我们不是那样，我们只是要一种比友谊更深刻的东西。我常想，我活在世界上什么事我最想要的呢，就是爱一个人，这个人不管是男是女，只要彼此能激发出深情，二帕，只要有了这个，我什么都敢做，什么都不怕。二帕，现在我才真正明白自己，我一点都不爱碰碰，我根本不在乎他，可是我在乎你，你知道你多让我动心，你是一个非常特别地女人，只有我才能欣赏你，你知道吗？二帕在黑暗中低着头，她的脸有点发烫，意萍的激情使她深感到了惭愧，她喃喃地说：意萍，你才是真正精彩的女人呢！”^[13]两个女性因为互相了解与懂得产生了和异性之间所没有的心灵沟通与交流，互相欣赏与尊重是她们交往的前提，这种情谊同样非常深刻与珍贵。但生活终究是坎坷的，二帕想利用老律却被他伤害，两个女人无法处理好生活中的种种小磨擦与矛盾，最终意萍赌气般地结婚，两人的恋情以失败而告终。但不能否认的是，在这部作品中碰碰和老律这两个男人都处于陪衬的地位，他们和女性相处、恋爱的目的和动机的不纯洁性愈发显得女性之间情谊的可贵，传统文学中伟岸的男性形象在这部作品中被凸显的女性形象所遮蔽和掩盖，作家借女同性恋叙述彻底放逐了男性。

从上面的文本分析中便可以看出，陈染、林白笔下的这种同性情谊绝大多数都是建立在反抗父权、夫权基础之上的，黛二也是在被以母亲为代表的传统家庭的常年压抑下去寻

找一个新的心灵出口，女性结成同盟更多地是为了反抗传统樊篱，并非出于一种清醒的同性爱欲的需要，笔者之后要谈到的一些作家的创作情况与此又有所不同。

2、黑暗国度中的“孽子”与“荒人”

如果说陈染、林白笔下的同性情谊还是结成女性反抗同盟的体现，那么作家王小波、白先勇、朱天文、邱妙津、崔子恩等人的创作，则更加直接和深刻地展现了纯粹发自内心的同性情爱世界。无论是白先勇先生笔下的被父亲逐出家门、生活在黑暗国度里的“孽子”们（《孽子》），还是朱天文笔下的无法逃脱社会枷锁、生活在“内心的荒原”上的“荒人”们（《荒人手记》），都使我们能够看到一个最为真实的同性恋者的生存环境及心理状态。这些关于同性恋的文学书写可以呈现给读者这样一个大致的面貌：从王小波笔下的主人公发现自己是个同性恋者开始，同性恋者们经历了尴尬的自我认可过程；而白先勇笔下的“孽子”们和朱天文、邱妙津笔下的“荒人”和“鳄鱼”，在自我身份确认之后却又被逐进无尽的黑暗世界当中独自承担凄凉与迷惘；直到作家崔子恩的笔下，读者们才看到逐渐强大起来、走向自我解放之路的同性恋者。由此可见，同性恋文学的书写在一定程度上是印有时代发展的烙印的，同性恋者形象的发展历程折射着现代文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历程。下面笔者将据此发展脉络结合文本进行逐一分析。

作家王小波深入地探讨了真正同性爱的萌芽及其同性恋者尴尬的身份发现问题。在小说《似水柔情》中，作为正统社会中的权力代表警察小史听同性恋者阿兰讲述自己的经历的时候，他也在不知不觉中逐渐意识到自己“本质”，即潜在的同性恋倾向，并最终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同性恋者。这就是说，他身上早就有同性恋的种子，或者他早就是个同性恋者而不自知。阿兰说，同性恋是他生活的主题，爱一个男人和被一个男人爱，是他此生所期待的成就。阿兰已经清楚地知道自己的性取向，他已经学会坦然面对，可是小史在自我确定的过程中是十分痛苦和纠结的，意识到自己对另一个同性产生了爱情让他背负上巨大的精神压力。但与之前的女性反抗同盟之下的同性爱相比，这种同性爱更为坦率与真实，这完全是发自内心的爱欲需求，与社会环境的影响并无多大关系。王小波用客观而直接的心理状态描写的方式娓娓道出了真正的同性恋者在这种爱欲刚刚萌芽时的心声，这一点是难能可贵的。作家显然对这种爱欲的少数形式产生了兴趣，除了用小说的形式进行表现外，他还专门写了一些相关论文，进一步表明自己的看法，比如在《同性恋成因问题》一文中，王小波这样写道：“现在回顾起来，我们倾向于同性恋是一种文化现象，这样和我们的领域比较接近。现在看来，研究者往往受私心的左右，难以做到价值中立。这是不好的。顺便说一句，我不认为，假如同性恋是自然现象，对同性恋本人就有什么光彩之处，文化现象不一定坏，自然现象也不一定好。但是我也很能理解同性恋者的苦心。”^[14]也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尊重客观存在的立场，王小波的小说很好地揭示了同性恋者自我确认的心路历程，虽然在他的笔下同性恋者的身份确认是尴尬的，但在 90 年代初期，这样的书写无疑给读者们带来了对同性恋者一种全新的认识。

如果说王小波的作品让读者了解了同性恋者在刚发现自己身份时的挣扎与触动，那么对于同性恋者来说，是否和如何接受这一身份更是一道难题。身份的接受必然伴随着困惑，他们是正统文化里的被驱赶者，被赶入到一个黑暗的国度里独自体味困惑，台湾作家白先勇以长篇小说《孽子》为中心的一系列同性恋作品对此进行了可谓惊世骇俗地深入表现。他特别关注的是同性恋者在正统文化里的那种被边缘化的失落感，对同性恋者所面临的种种困惑以及社会压力进行了最为直观的书写。

白先勇起初在这一领域的创作都是围绕着同性爱者对爱情和青春的缺失与渴望进行的，如小说《月梦》、《青春》、《满天里亮晶晶的星星》等等。在这一阶段的创作中，作者之所以选取围绕着青春与爱的不可得来表现同性恋者的生活，是因为作品中的主人公无法抗衡正统社会中世人的眼光，他们想隐藏自己处于“边缘”的位置，抓住青春与美貌成了他们自认为在主流社会中站稳脚跟的一种途径，同时也是留住他们所渴望的爱情的一种方式。《月梦》中的吴钟英医生总是怀念自己在青春年少时所拥有的一段温暖的爱情，而日渐老去的他似乎在同性圈子当中再也没有去爱别人的资本；《青春》中的老画家惧怕老去的一切，他想尽办法、拼命甚至可笑地想留住自己的青春：往自己满是皱纹的脸上涂厚厚的雪花膏，穿学生时代的衣服，对活力四射的青春少年满怀渴望，然而当那位少年逃脱他神经质一般的追逐后，他的生命也在那一刻戛然而止；作品《满天里亮晶晶的星星》中的朱焰曾经是一位帅气的、“红遍了半边天”的电影明星，当他老去后不能接受自己的样子，为了缅怀年轻时候的自己，他倾尽所有重拍了他主演的最后一部电影，并将所有的希望寄托于男主角姜青身上，而姜青最后的死亡也带走了朱焰最后的希望，他们一同消失了。前期的这些作品中，白先勇只是旁敲侧击地从外围、即青春易逝的角度来展现同性恋者对于青春与爱情的重视、对于在正统社会中永久立足的渴望，由此透视出正统社会对同性恋者施加的隐性压力。

随着白先勇自己同性恋者身份的确认，他在这一题材领域的创作变得更为大胆和直接，著名长篇小说《孽子》就是他的代表作。在这部小说中，主人公“阿青”是整个台北新公园那个群体中的代言人，他的经历同样也是阿龙、阿凤、小玉、老鼠等人的遭遇。自从同性恋身份确认和公开后，他们便被父亲们当做大逆不道的“孽子”逐出家门，从此陷入了无尽的“黑暗国度”里：“在我们的王国里，只有黑夜，没有白天。天一亮，我们的王国便隐形起来了……”^[15]在这个黑暗国度中，这群无所归依的年轻人只能通过种种为其他常人所不堪的手段来互相取暖，小玉在他的华侨干爹那里获取的不只是金钱与安稳的生活，更是一种想要成为一个家庭当中一员的渴望；老鼠的哥哥三天两头就会对他进行毒打，但老鼠仍愿意和他住在一起。家庭温暖的缺失、父子之间感情的断裂，让身处黑暗国度中的孽子们被困其中。其中吴敏这一人物让人印象深刻，尽管张先生对吴敏非常的绝情，即使是在他割脉自杀住进医院的时候也没有半分的关心，但吴敏却近乎虔诚地对他付出一腔挚情——在张先生抛弃他后割脉自杀，却又在张医生最孤独痛苦的时候，毫不犹豫地答应“搬回去跟他一块儿住”。最后张先生因中风半身不遂住院，他又“天天下了班得去服侍

他”。这种痴迷不仅仅是因为吴敏对张先生的感情，更大的意义上还在于他对于张先生所给予的那个家的迷恋。吴敏出世的时候，他那个“好赌如命”的父亲正在“头一次下牢”中，他自小就是在别人家里长大的。等到“父亲出狱把他接走”，以为能拥有一个自己的家，哪知道却过着东飘西荡的生活，“我跟着我老爸流浪，两三年倒换了七八个住的地方。总是因为欠房租，让房东撵走”。因而，当他搬进张先生家，“以为总算有了个落脚的地方”时，他对于这个家是如此的欢喜——在他的嘴里，“连洗澡间也说成天堂了”。正是因此，“在张先生家里住了那么久，不知不觉便把他那里当做自己的家了”的吴敏，被突然撵出来时，才会“一时心慌，觉得走投无路”，“做出那种事来”。不仅是这群年轻人，就连杨教头、盛公也是曾经的“故事的主角”，盛公那张“衰老而无奈的脸”似乎在掩饰着“一些最黑暗最黑暗的隐痛”。^[16]在笔者看来，这群身上满布着各种缺失的同性恋者似乎将爱情当作了一把万能钥匙，以此寻找他们所缺失的种种，显然这种寻找的动机和途径本身就是不健全的，它所能带来的至多不过是某种程度的慰藉而已。所以，白先勇先生笔下的“孽子”们还只是身处痛苦之中不能自拔，他们对这种现状充满了困惑却又无力改变，索性便放弃了挣扎与改变的机会。但不得不说这是同性恋人群一个自我认识的良好开端，他们逐渐开始明白自己的这种行为不会被主流社会、家庭轻而易举地接受，正是有了这种认识，我们才得以在后来作家们的笔下看到他们进一步为自己争取权利所付出的努力与直面现实的勇气。

台湾作家朱天文的《荒人手记》是一部以第一人称的叙事方式描写了男同性恋者生活的长篇小说。同为台湾女作家的邱妙津，与白先勇先生一样，自身就是一位同性恋者。她结合自己的生命体验，创作了小说《鳄鱼手记》，讲述女同性恋者之间的故事，继续深入这一创作领域，并且在当时的台湾文坛上以及社会各界引起了广泛而热烈的讨论。值得注意的是，这两部作品均不谋而合地采取了第一人称进行叙述。还有另外一个不容忽视的巧合便是：这两部作品都以“手记”二字命名。这充分说明了两部作品都是作家已经将自己融入了同性恋者这个身份当中、力图展现给读者一个最为直接和真实的同性情爱世界的用心之作。这种带有自传性的直接和真实的描述无疑能够更加打动读者，使读者更愿意亲近这一特殊群体，站在他们的立场上去思考问题，从而包容、接受他们。两部作品都书写了同性恋者在主流文化的挤压下，身心分离、难以逃脱自我困境的故事，朱伟诚曾经指出：“这种现象亦非偶然，而是代表了那个历史时刻亟欲听到及终于讲出的同志主体的幡然现身。”^[17]《荒人手记》也因此获得了“时报百万小说”的首奖。这部作品中的自述者“我”、也就是小韶，永桔、阿尧、杰都被作者比作“荒人”，因为他们生活在自己“内心的荒原”上，异性恋霸权深深地压抑着这些“荒人”们，他们找不到同性恋这种生活方式的积极意义，不敢面对外界社会的不认同，只能活在自己所圈定的“荒原”内。在小说中，朱天文用特有的细腻笔触为读者们描绘出了她视线内的同性恋者们的荒凉境遇：阿尧的妈妈虽然对阿尧带同性情人回来没有做任何阻拦，但在他们离开之后扔会拼命的打扫屋子，像擦洗细菌一样；妈妈的后半生都只是为了阿尧能够信主，来洗刷阿尧作为一个同性恋者的罪恶。而在作者看来，生活在荒原上的不只是这群

同性恋者，所谓的正常人也是生活在“脆弱的宇宙秩序当中的”，文中有这样一段话：“我说阿尧，我们的世界，狂野又荒凉，妈妈她一辈子不会理解的。不是不愿意，是不能。不能的，一般人都不能，他们秩序的宇宙是也很脆弱的啊”。^[18]整部作品营造出了一幅幅这样凄凉悲怆的画面。而在一次次地挣扎无果之后，“荒人”们只能心如死灰：“当我以前恐惧一次次飞蛾扑火的情欲袭卷来时，以及情欲过后如死亡般的孤独，我害怕极了面对那种孤独。而现在，我只不过是能够跟孤独共处。安详的与孤独同生同灭，平视着死亡的脸孔，我便不再恐惧。”^[19]“我”和阿尧这群“荒人们”都经历了从恐惧到孤独的绝望幻灭之感，最后只能听凭命运的摆布。作者通过对这些人物心理发展变化的状况描写，引导读者去反思我们这个“正常社会”对同性恋者无情的压抑与摧毁。与此同时，在朱天文笔下还写到，“荒人”们尽管无法走出自己内心的“荒原”，但还是顽强的抗争和生活着，在这个意义上，“荒人”们并未放弃最后一丝希望，这与白先勇先生笔下的“孽子”们放弃挣扎与改变的态度有着质的区别。邱妙津的《鳄鱼手记》也以同样细致的笔触表现了女同性恋者在“正常社会”中苦苦寻求生存空间的痛楚经验，其中的拉子与至柔，虽然都承认了自己是爱同性的人，但并不敢认可自己的同性情欲。陈思和认为，“邱妙津的写作正反映了台湾解严初期同性恋文化所处的新的暧昧阶段：一方面是同性恋文化已经获得了公开表达的权利，另一方面则在当事人及其社会环境对此文化现象依然存在着痛苦的认同迷惑。”^[20]尽管在朱天文、邱妙津等作家的笔下同性恋者依旧存在被认同的困惑，但与白先勇创作《孽子》时期相比，台湾的整个文化大环境已经对同性恋者逐渐表现出一种包容的心态，给予了作者公开表达同性恋文化的权力，这无论是在形式上还是在实质上都是一种进步。

随着时代的进一步发展、社会的开放与进步，同性恋者们的自我维权意识越来越明晰。对于困惑，他们再不是一味的忍耐，一味地与现实随波逐流，而是注重从自我出发，摆脱枷锁，实现自我的解放。作家们也及时地对于这一明显的变化进行了书写与表现。大陆作家崔子恩是当代文学界中一个比较特别的存在，他与作家白先勇先生一样，自己本身就是一位同性恋者。而与白先勇先生所表达的悲悯、同情、挣扎的情感状态不同，崔子恩以一个极端自恋的同性恋者身份，来讲述自己的生命体验的。他在《我爱史大勃》、《桃色嘴唇》等作品中大胆地描写了同性之间的性爱，并认为“这有什么可耻，你只在你异性身上倾注与性欲相关的热情，他只在同性身上如此。”与白先勇先生笔下的孽子悲观、无助、茫然的形象不同，《桃色嘴唇》中的“叶红车”是一个十分富有激情的人物。在作品中，当叶红车“看到画报上飞奔的马，我总是会流下泪水。那种动物的迅疾和力量，令我怦然心动。”^[21]他渴望充满力量的生活，而这种力量就可以帮助他在现实社会中更加“理直气壮”地用自己的方式去生活；而他在上大学时之所以选择历史专业，也有他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进入人人都身处其中的‘历史’更加名正言顺一些”^[22]，看来他不仅是要求自己充满力量，更要“名正言顺”的生活下去。这位“叶红车”俨然是作家崔子恩的一个活生生的影子，他肆无忌惮地追求自己的爱情并无视周围人异样的眼光。这样大胆的、不顾世俗眼光的坦白显示着同性恋者逐渐在主流社会中“站了起来”，开始冲出世俗的牢笼，虽然仍未被认可，但就他们自身而言，却是迈出

了历史性的一大步。

3、依然行走在“生活的冻土”上

进入 21 世纪之后，更多的作家关注到了同性恋者这一群体在现实社会中要和平常人一样真正生活下去所面临的困境。作家们敏锐地发现，即使同性恋者能够挣脱自我内心的枷锁，在精神上完成自我认同，但现实生活始终是无法逾越的障碍，他们仍然是在“生活的冻土”上行走。

同性恋者的此种生存境遇在女作家严歌苓笔下得到了最为集中的展示，其小说作品《也是亚当，也是夏娃》中的“亚当”是一名美国人，一位 gay（对于男同性恋者的称呼），他为了与自己的同性爱人拥有一个孩子，精心选择了一位身体、品德各方面都健康的中国女人“伊娃”做为孕育孩子的母亲。做为亚当自身，他认为自己与同性爱人之间的“爱与性不是功利性的，没有繁衍自身的基本目的”^[23]，这是区别于异性之爱的最为独特与崇高之处。但是当母亲去世以后，亚当又开始恐惧，他开始问自己“什么是我留下的再作为我留下来？”^[24]，正是这种想留下一些什么的念头让他开始策划生一个孩子。亚当这种矛盾的心态是同性恋人群比较典型的心理代表。然而最终孩子的夭折、爱人的背叛、计划的失败让亚当痛不欲生。作家严歌苓的视野一向比较宽广，她的描写范围还经常涉及到国外，相对于我国较为保守的环境，该部作品中的主人公亚当生活在一个极为宽容的世界中，他拥有比较高的社会地位与足够的金钱，从外部条件来看，他似乎已经可以不受任何条件的束缚去过自己想过的生活，然而现实还是无情的摧毁了他美好的愿望，他所向往的家庭子女问题依旧是一个无法突破的瓶颈。《学校中的故事》中的主人公帕切克是一名严肃、认真、负责的老师，但因为他的同性倾向使得学生们小心翼翼的远离他，不肯接受、承认他是一名好老师。这种在工作环境中受到的排挤与抗拒同样也是同性恋人群在现实生活中无法逾越的障碍，一个真正幸福的人是需要得到多方面肯定的，公众社会的打压无疑为他们的心灵带来致命的伤害。小说《魔旦》中，美丽的少年阿玫 12 岁便登上了旧金山的码头，开始在这个开放的城市主唱旦角，最终成为“金山第一旦”。而私授音乐课的教师奥古斯特在不知不觉中爱上了这位来自中国的美少年。阿玫在少年阶段贪婪地接受着奥古斯特的关心与金钱方面的馈赠，然而在他成人之后他毅然将爱欲转向异性，奥古斯特却在与阿玫的交往中“几乎忘记了自己有个家庭，阿玫让他对他那父亲和丈夫的庄严角色严重渎职。他心甘情愿把自己天性中的要害暴露给阿玫，随阿玫掌握它，触痛它。”^[25]最终奥古斯特被刺杀，终止了他悲剧的一生。这种爱人之间的背叛也同样扼杀着同性恋者对爱的坚持与守望。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点与异性恋并无两样。

同性恋人群还面临的一个严峻的现实问题就是婚姻问题，同性恋人群不得不与异性结婚的现实压迫给同性恋者带来了无限的困扰却无法轻易逃脱。即使是在西方社会，不结婚的同性恋者无论是在形象上还是实际利益上都会蒙受损失。正如格兰姆斯在《性后果》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男子到 30 岁尚未结婚，人们就会认为他有什么问题，或疑他是同性

恋者，或疑他是性游戏者。他在军界、公司、政界及工会组织中都不会升至高位。在学术界和艺术界有成功的可能性，但在人们眼中仍是可疑分子。因此可以认为，结婚和正常的外在表现是男人事业成功的助力。”^[25]在西方尚且如此，在更看重婚姻和家庭价值的中国，同性恋者自然难逃“被结婚”的命运，再加上男性承担着家族“传宗接代”的使命，我国的男同性恋所承受的结婚压力大大高于西方社会中同性恋者所承受的压力。虽然不愿意结婚，但是很多同性恋者迫于父母、社会规范的压力，为了履行对家人和社会应尽的责任，他们还是步入了让他们不情愿的婚姻牢狱。但是，这种婚姻必定是无法长久的，还会伤害到婚姻中的另一半及其同性恋人，如果有了孩子，对孩子的打击也是可想而知的。在香港作家智疯创作的短篇小说《复活不复活是气旋》中，浩辉发现父亲与他所敬爱的叔叔有同性恋人的关系时万分痛苦，感觉本以为所拥有的美好家庭在瞬间瓦解破碎，不知道自己的生活将何去何从。

这些文本都带领读者思考这样的一些问题：社会对同性恋者们的歧视与偏见给他们带来了来自各方的压力，而这些压力又以同样的力度返回给了家庭以及社会，久而久之就形成了恶性循环。因此，我们应该给予生活在当代社会中的这些同性恋者们以怎样的宽容、理解和支持，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深思。

在台湾作家洪凌的小说《玻璃子宫的诗》中，女同性恋者沙沙通过人工授精生下了她和同性爱人贝贝的孩子，后来贝贝死去，她只能与自己十月怀胎生出来的女儿水凌相依为命。故事就围绕着这对奇怪母女之间的矛盾展开，女儿水凌痛恨母亲带她来到这个世界上，而母亲沙沙对女儿最深沉的爱却得不到她的理解。在母亲看来，女儿的存在“是对于这个以谦卑规范构筑的世界的某个狠辣耳光。”^[27]这是女同性恋者以她们生命延续的方式向这个世界提出了控诉，然而这个被生下来的孩子却要面对来自社会中各种不友善的眼光。整部作品中充斥着母亲与女儿呓语般的自白，混乱的语言下隐藏着的是她们的混乱的无所归依的心。这部作品与之前同性恋题材的作品相比，作者给予了主人公拥有家庭与子女的权力，可现实却是无情的，在他们争取到自己的权力之后却没有将权力进行下去的能力。由此可见，社会观念的束缚以及同性恋者自身的局限性不能为他们提供一个自由且安全的环境，让他们像正常人一样生活。另外，香港作家加里多创作的《妹妹晚安》对此也有所体现，都描述了同性恋者们在得到爱情之后继续面对的一系列的家庭问题等。

这些进入新世纪以来作家们所创作的文本都揭示了同性恋者在现实生存中面对的一些新困境：在他们自身心灵的解放以后，他们在社会上还要面对重重问题，如恋人之间的不理解、逃避责任、背叛，公众社会的打压，自身生理的局限性，家庭与子女不可兼得等等问题。

当代描写同性恋现象的小说作品数量众多，并且不同时期不同处境的作家们对这一现象的关注角度和表现侧重有所不同，正是这些不同给读者们展示了真实的同性恋生活圈。通过上述对当代同性恋小说的梳理可以发现，从新时期女作家们的反抗父权、夫权，追求

女性自我意识的书写，再到王小波、白先勇、朱天文、邱妙津、崔子恩等作家紧贴时代的细微把握，同性恋创作呈现着一个不断深化的趋势，开始从外在规范的反叛走向发自内心的对同性情爱的追求，由此也可以看出同性恋这一独特文化现象的变化，尽管现实生活始终是无法逾越的障碍，但是社会对这一现象的态度越来越宽容，同性恋者也越来越注重从自我出发，摆脱枷锁，实现自我的解放，他（她）们的自我维权意识越来越明晰，这无疑从一个侧面反映着文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三、当代同性恋文本的创作动因及其文化内涵

在第二部分中，笔者分析了大量的当代同性恋小说，这些文本汇集起来，形成了关于这一独特文化现象的一个总体概况。不难看出，当代作家对于这一领域还是较为关注的。除去时代发展以及社会开放等因素，同时还值得我们深思的是作家们的创作动因与文本所体现出来的文化内涵。

1、对传统性别文化的反叛

在传统性别文化观念中，异性恋一直被人们视为“正统”，而男性又是“正统”当中的主导，占领着重要地位，这种正统观念几乎贯穿着人类发展的主线。虽然在我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诗歌和明清小说中都有着对于同性恋文化大胆的艺术表达，但总体而言我国在这一方面的发展还是较为保守的，传统的性别文化在人们的观念中根深蒂固。传统文化是以男性、家族为本位的文化模式，如果忽视甚至颠覆男性、家族的存在势必会遭到传统社会的排挤与异样的眼光。女性自古以来一直是男性的精神和欲望的对象物，这种对象化往往是压抑了女性自身的生命逻辑的，体现出男性对女性的性别霸权意识。即使是女性在五四以后的社会发展中逐渐获得了男性些许的同情，那也是以女性向男权意识形态理念的臣服为前提的。这种同情在某种意义上更加证明了男性对于女性高高在上的态度，社会还是以男性的眼光去审视和要求女性，使得女性的主体性得不到建设与发展。女性们似乎是逐渐开始浮出历史地表了，但实质上依旧是缺席的，依旧是附属于男性的第二性。而女性自身的结局如何，是在苦难中沉沦还是获得拯救，都是以男性单方面的价值判断为标准的，忽略了女性自身真实的生命欲求。而同性恋文化正是与这种所谓的“正统文化”相对立的，“同性恋作为一种亚文化（subculture），有着它独特的游离于主流文化的特征，同性恋者作为一个亚文化群体，具有独特的行为规范和方式。”^[28]这种客观存在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挑战着传统性别文化，以陈染、林白的创作为代表，她们对女性之间同性情谊的书写大胆的指向了传统文化中偏枯的性别权力体系。虽然自五四以来，文化启蒙者们都在致力于解构这种以男性、家族为本位的传统性别权力体系，但这始终是一个没有完成的现代性任务。80年代中后期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传播，让“姐妹情谊”（sisterhood）成为女性主义者批判父权制的一个策略。由于女性之间相通或相似的被夫权、父权文化所压抑的经历与基本相同的生理基础，因此彼此之间很容易产生惺惺相惜的同性情感。她们之间可以分享内心的

各种秘密、苦闷和压抑，寻找心灵得以安慰的栖居之所，因而也就有机会结成温暖的女性同盟。同性恋因此具有了和异性恋分庭抗礼的意义，并同时构成对男权文化的突围，同性情谊的题材也因此有了更强的针对性和目的性。

陈染、林白笔下的同性爱题材作品大多以女性最隐秘的身体和心理感受为出发点，故而在客观上具有了一种拒斥传统性别文化观念的立场。作家让作品中的女性将男性完全地进行了放逐，将自身从传统的家庭模式中脱离出来，不再将自己定位于妻子与母亲的角色，因为这些角色都是与男性和家庭相关的，由此又形成了反抗传统性别文化的叙事模式。反过来看，这种叙事模式也暗暗迎合了这两位女作家笔下的同性爱题材，为女同性爱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可能的温床。陈染的小说《空心人诞生》是以一个孩子的视角进行叙事的，作品中的紫衣女人（妈妈）是位常年生活在父亲“淫威”之下的家庭妇女，身上经常带有被打的痕迹，而黑衣女人苗阿姨在“妈妈”被虐待以后总是能适当的给予心灵与肉体的疼爱以及照顾。这篇作品写得朦胧而含蓄，文中并没有过多的描述男性对于女性的家庭暴力，而是从两个女人之间互相的关爱出发，从孩子的眼中对比出男性的虚伪、浅薄与自私。因为同是女性，她们之间就有着一一种天生的认同感，面对来自男性的强权压迫，她们不自觉的组成了互相关爱的女性联盟。如果说《空心人诞生》当中男性还是隐隐存在的，那《破开》则在一定意义上完全把男性置于女性的背后了。“我”和殒楠把自己的感情命名为“破开”，“相信我和我的朋友殒楠之间的姐妹情谊一点也不低于爱情的质量”，这种无言的倔强反抗完全放逐了男性，女人们在“一间自己的屋子”^[29]中高扬自己主人翁的姿态。同时，“破开”这一命名也强有力地反映出作者秉持女权主义理念营造出的一个女性自给自足的世界。林白创作一系列表现女性同性情谊的小说同样也虚化了男性形象，无论是《一个人的战争》中的南丹，还是《瓶中之水》中的意萍，抑或是《猫的激情时代》中的“猫”，她们都以炙热的爱情表达一次次撼动着读者的心，带读者走入区别于异性爱的美妙的同性世界。作者之所以将同性爱描述的如此热烈，同样也是想解构以男性为中心的传统性别文化模式，力图建立一个属于女性自身的新秩序。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女性之间因为有着相通的生命经验、本能的性别认同，她们在与同性的相处中感觉到了“顺乎天性，自然而然，就像水理解鱼，空气理解人类一样”的自在自得，在相处的过程中她们感觉到了从男性那里无法得到的被理解与被重视的快乐。这无疑是在精神层面上肯定了同性情谊所带来的主体存在感。女同性恋现象及小说书写在不同时期不同评论家那里有着多重解读，但不管是自我觉醒、抗争、解放，还是彻底颠覆、反叛以男性为中心的传统文化，都显现出作家们对于女性这一独立个体的重视与关爱。

陈染、林白笔下的同性爱作品在反抗以男性为主导的正统社会的压迫是具有一定现实意义的，但就同性爱题材方面的创作而言还是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她们笔下的女性在一起大多数是为了结成保护自己权益的同盟军，并非出于自己清醒的爱欲需要。但对于女同性恋者来说，爱不仅仅是本能上的一种欲望追求，更是作为一个人所拥有的主体性和自身自由价值的体现。从五四时期开始，女性写作经历了从他者救赎到自我救赎曲折的百年历程，

女性同性爱创作可以说达到了女性写作的一个巅峰阶段，女同性爱创作也意味着女性们走上了一条能够独自行走的道路，一条与男性无关的独立的道路。

2、对传统性观念的颠覆

在人类发展的历程中，性一直是无法忽略的重要存在。在原始社会，性只是一种本能，还未被赋予其特殊的含义。随着时代的进步与发展，对性的认知开始从本能论逐渐发展为生育论和情爱论，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指出：“现代性爱，同单纯的性欲，同古代的爱，是根本不同的。它是以所爱者的互爱为前提的。”^[31]这种观点迅速地被人们所接受，即发展为后来的情爱论。这一观点无疑保障了人类对性应当享有的权利。同时，在笔者看来，这也为同性爱的存在提供了一个合理的解释。虽说情爱论的观点是具有一定的进步性的，但它也无意、更不能改变一个事实：从古至今的性观念，基本上都是建立在异性恋基础上的。“盖格农和赛蒙在《性行为》一书中指出：‘关于自然和普遍人性的信念在性研究领域的地位比在其他任何领域都稳固。’性在两个意义上被‘自然化’了：首先，一种占统治地位的假定认为。应当把人类的性当作一种生理功能来理解。这一功能扎根于进化论的必然性之中，然后被直接转换为社会制度和文化规范。其次，在人们接受了某种性表达是‘自然的’这一推论之后，其他种类的性表达就成为‘不自然的’了。”^[32]从以上这段话可以看出，性在无形中参与规定了人们的社会文化制度，这种社会文化制度一旦建立起来就无法轻易被否定。人们已经被灌输了异性之间的性是“自然的”存在，那么同性之间的性表达自然就成为了一种不自然的、不合规范的存在。

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扎根于大众的思想中，很难在短时间内有所改变。在我国传统文化中，“性”一直是一个尴尬的存在，它虽在山野民间一直有着勃勃生机，但在文化传播中一直处于被遮蔽的状态，即使有所表现，也是“犹抱琵琶半遮面”，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上半叶。我国现当代的文学作品中，在改革开放之前，整个涉及到性描写的作品数量都是相当有限的，然而进入90年代之后，对于性进行公开描写的作品在数量上大幅上升。张贤亮、莫言、王安忆等人创作了一些具有突破性意义的作品，一定程度上给读者带来了对于性的全新理解。正是因为有了这种开放的文化氛围，一些作家也大胆的将笔触伸到了同性爱题材的作品创作，读者也开始慢慢接受、了解同性恋者这一特殊群体的生存状态。正如马克思所说，伴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当代的性爱是和情相伴相生的，只要是忠于情所发生的性爱都是可以被接受的。但这一观点被人们接受通常只是在异性恋之间，同性之间的性爱被人们不自觉的排除在外。然而，同性恋者与异性恋者无差别的都是对爱人产生建立在情感之上的性冲动，用的是一样的情，除了对象是同性之外，其他的一切都与异性恋无异，这应该是被大众所接受的。在同性恋者看来，性还有更深的文化隐喻。马尔库塞认为，同性恋是性欲讨厌服从生殖秩序而发出的抗议，是性欲对保障生殖秩序的制度提出的抗议。同性恋现象中包含着革命的潜力，是对生殖秩序的反叛，是一个“伟大的拒绝”。^[33]

笔者认为，同性恋行为不仅是对生殖秩序的一种反叛和拒绝，更是指明了某种充分的爱欲意义，代表了肉体的可能性的充分实现。这在王小波的《似水柔情》等一些作品里得到深刻体现，王小波是一位极具社会责任感的作家，对社会现象有着文学家特有的敏感度，对于同性恋者感情及性的发生，他认为是很正常的，他深入探讨了同性爱的本质，不满于同性恋者仅仅是因为恋爱对象是同性就被剥夺了人类应该拥有的自然情欲，通过对同性之恋基于“实事求是原则”和“善良原则”（王小波语）的书写，颠覆了以异性恋为中心的传统理念，把长期被歧视、被有意遮盖的同性恋现象“正常化”，借此暗讽社会大众视同性恋为洪水猛兽的偏见心理，冲击了人们心中根深蒂固的性观念。在小说《似水柔情》中，警察小史起初是读者们眼中的正常人，他在每晚值夜班的时候总要去公园抓几个同性恋者来作为消遣以度过漫漫长夜，并且“审讯”他们。他抓住阿兰的那晚只是一个和平时一样普通的夜晚，但是阿兰一整个晚上对自己童年以及一些同性恋经历的叙述让警察小史的心理有了一丝微妙的变化，他听着阿兰的讲述在不知不觉中有了一种“憎恶”，作者给我们的解释是：“与其说他憎恶阿兰曾经获得的快感，不如说他憎恶这种快感与己无关。”^[34]正常的人听到同性爱行为应该是觉得索然无味的，可是警察小史却如此的激动，直到后来他收到阿兰的书，重新回顾那一夜的经历时，意识到那一夜的对抗其实带有认同的意味，虽然小史在伦理情感和价值观上是轻视厌恶同性恋的，可在那个夜晚他认出了自己的潜在真相。这种认出真相的现实存在就是对以小史为代表的所谓“正常人”传统性爱观念的一种颠覆，即小史在潜意识里也是认同甚至向往同性之间的性爱的，小史憎恶阿兰曾获得的快感与己无关，说明小史在一定意义上也是承认、肯定了同性性行为表达了充分的爱欲意义，这与异性间的性行为带有生殖的目的性是有所不同的。作品中这样的描写也许不太容易被大众广泛的接受，但正如王小波及其夫人李银河所言，“希望通过这样的书写来引起社会足够的重视，从而赋予同性恋者真正的人的权力。”^[35]

白先勇、邱妙津、崔子恩等作家基于自身生命体验的书写更是呈现了一个自然、真实的同性情爱的世界，显现了这种性爱形态存在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也对传统性观念形成了挑战。在这些作家的笔下，对传统性观念最具颠覆性的是女同性恋之间的性爱状态，在异性恋中，女性总是被男性作为一种欲望的对象，她自己的欲望很少能够通过其主动性得到满足，女同性爱在一定程度上为她们提供了能够显示其主体性的一种途径及方式。对此，波伏娃有着一段精辟的描述：“女人是一个要把自己变成客体的生存者；作为主体，她的肉欲中有攻击性成分，然而它未从男性身体得到满足：于是便出现了她的性冲动必须加以克服的冲突。被认为是正常的或‘自然的’制度，把她作为某个男性的猎物予以抛弃，同时又让她怀里有一个孩子，以恢复她的主权：但这种所谓的‘正常’，受多少被明确认识到的社会利益的左右。甚至连异性恋也容许有其他解决方式。女人的同性恋，是将她的自主性与她的肉体协调起来的一种尝试。”^[36]女人在异性恋中一直是处于附属品的位置，感情上尚且如此，性经历中也难逃其命运。因此女同性爱中其精神的主体性与肉体协调的高度统一也是女性在性爱中所追求的理想状态。台湾作家邱妙津《鳄鱼手记》中的“我”，

也就是“拉子”，在描写自己对“唯一和我做爱的女人”小凡的感情时这样写道：“奔涌的热情完全导向小凡，宛如飞蛾扑火，我放任自己水坝里的爱欲之潮尽情的狂奔，狠狠的去爱小凡，不顾一切的姿态，到了毫无廉耻的地步。卑贱。”^[37]这段歇斯底里却又充满自嘲的描述无疑是十分大胆的，拉子对小凡的爱已经超越了性别的存在，展现了女性之间的理想性爱状态，同时这种酣畅淋漓的表达就是想告诉读者同性之间的性爱存在和异性之间是平等的，是没有高低贵贱之分的，人们有权利选择自己生活的方式。这些都是基于作者邱妙津自身的生命体验的，是源于自然、真实的同性恋世界的，为我们真正去了解同性恋之间的真实生活状态打开了一个通道，也是对传统的性观念的一种颠覆。

3、指向深层的人文关怀

在当代的文学创作中，同性恋书写越来越多。笔者认为，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人们思想观念的进步，作家们都开始以一种宽广的胸怀去接纳新的事物，关注一些还未被表现透彻的领域，并且站在一种客观的角度去展现这些新事物，透出一种浓郁的人文关怀气息。在一些作家们的笔下，同性之间的相互吸引、相互抚慰焕发出迷人的人性审美色彩。作家们描述了多种多样的同性爱情，和异性恋无异，它们有的悲伤、有的浪漫，有的凄美，有的感人；同时还塑造了一批真实感人的同性恋者形象，将他们的情感世界展现给读者，表达他们对于爱情的追求和向往，展现了人性的本真。在《人的文学》一文中，周作人给人道主义下了这样的定义：“我所说的人道主义，并非世间所谓悲天悯人或博施济众的慈善主义，乃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38]这是人道主义文学思想在中国的最初形成。而同性恋做为一个特殊的人群，相对于其他人来说，他们即是单独的个体。作家既然发现了他们的存在并且对他们的心理发展状态进行了详尽的描述，就是基于他们是单独的个体，使他们首先具备了人的资格，占得人的位置。在这个基础之上，作家们从关注人本身出发的人文关怀，正视了同性恋的客观存在，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的进步。我们说，存在的即是合理的，在最初的同性恋现象书写中，作家们并未一开始就去证明同性恋存在的合理性并为他们争取一些利益，而是先从个人本位主义出发正视了其客观存在，把他们当作一个平等的、真实存在的对象去表现，客观公正地将他们的生活展现在世人面前，这是对这一少数人群最起码的尊重的表现。作家白先勇曾经这样谈及自己小说创作的程序：“多是先有人物。我觉得人物在小说里占非常重要的地位，人物比故事还要重要。就算有好的故事，却没有一个真实的人物，故事再好也没有用。因为人物推动故事，我是先想人物，然后编故事。”^[39]白先勇先生因为从小受到基督教的熏陶，他思想中的以人为本的观念很重，对他笔下的身处亲情边缘的同性恋者们更是倾注了无比的同情与怜悯，作品《孽子》当中的傅崇山虽然是一个极为刻板的传统道德的捍卫者，但就是因为作家赋予他的一种特有的悲天悯人的情怀，他便愿意“伸手去援救你们这一群在公园里沉浮的孩子”。^[40]人的高贵和尊严是人道主义的核心价值，在一些作家们笔下，同性恋者在现实生活中是绝对没有高贵和尊严可言的，而他们也只是将这一现实客观的陈述了出来，如

何去做的权力以及对此类事物的评价标准都留给读者来作答。

而自身就是同性恋者的作家更是描绘了生命存在的真相，表达了发自生命深层的欲望要求，深化了人对自身的认识。朱光潜曾经指出艺术活动是艺术家“自由的活动”，“完全服从他自己的心灵上的要求”，而“这自由性充分体现了人性的尊严”。^[41]朱光潜还指出，艺术不但自身是一种真正自由的活动，而且也是令人得到自由的力量。作家白先勇、邱妙津、崔子恩等人，因为他们自身就是同性恋者的关系，他们的创作本身就是“自由的活动”，就更能直接体现同性恋者的心理发展变化过程，以及他们如何从最初的困感到给予自身心灵的解放。白先勇先生在接受蔡克健的采访时对自己的同性恋倾向这样承认道：“我想那是天生的。”^[42]身为国民党著名将领白崇禧的儿子，白先勇的性取向让他自己背负着巨大的精神压力，他只能通过作品来抒发自己的感情和心底的郁闷，在《给阿青的一封信》中他这样写道：“你无法告诉你的父母，也不愿意告诉你的兄弟，就连你最亲近的朋友也许你都不肯让他知道。因为你从小就听过，从许多人们的口中，对这种爱情的轻蔑与嘲笑……因为没有人可以与你分担你心中的隐痛”。^[43]这段话基本上是他心灵的真实写照，他无处倾诉自己的这种“心中的隐痛”，可是他又渴望别人的理解与关心，渴望得到真正的自由。通过小说创作，白先勇先生验证了艺术创作不但自身是一种真正自由的活动，而且也是令人得到自由的力量，他把自己心中的苦闷借小说中的人物之口说出来，借他们的心理表现出来。如作品《孽子》中对父子关系的特别描述，傅卫、龙子的父亲都是高级将领，这都与白先勇父亲白崇禧的身份暗暗符合，而父亲傅崇山在儿子死后对同性恋者态度的转换，也是白先勇所渴望的亲情救赎。白先勇先生在这部同性爱作品中穿插父子之间的伦理冲突不仅是因为自己的亲身经历，他更多的是想表达出书中这些有同性倾向的年青人是一群被亲情抛弃的人。然而这群被抛弃了的无依无靠的年轻人，并没有因此丢失他们性格当中人性的善良与纯洁，因此人性的刻画也是白先勇先生在这部作品中重点着力所在，这也体现出了他一贯的创作特色。而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他连续创作的两篇同性恋题材的小说《Danny Boy》和《Tea for Two》都讲述了同性恋之间照顾患有艾滋另一半的感人故事，这并非偶然，1992年与白先勇相恋近四十年的同性恋者王国祥去世，在王去世之前的三年中白先勇都对他进行了悉心的照料与安抚。恋人的离世对他产生了致命的打击，让他有“那是一道女娲炼石也无法弥补的天裂”^[44]的感觉。因此那两篇小说也与白先勇先生的亲身经历有关，他将自己失去恋人的痛楚也在小说中尽情宣泄了出来。由此可以看出来，小说创作是白先勇把自己与外界联系起来的媒介，也是他宣泄自己情感的一个通道，与此同时，他的小说创作对他自身也有着救赎的作用，为他面对自己、面对人生提供了力量。小说创作的自由性为这些作家提供了“服从自己心灵要求”的可能性，使他们能够从自身经历与心理变化出发对同性恋者的生活进行直接的展现，同时也为同性恋现象书写的人文关怀提供了一个更直接的思想来源。

另外一些作家们在历史和现实的时空中展示同性恋与政治的复杂关系，揭示了超越同性恋权利问题的广阔主题；还有一些书写深入到工业文明中都市人的生存状况中，揭示了

当代人的现实与精神困境。李大钊先生曾经说：“博爱的生活，是无差别的生活，是平等的生活，在‘爱’的水平线上，人人都立于平等的地位，没有阶级悬殊的关系”。^[45]他认为，“自由平等的生活，都是以爱为基础的生活”。对于同性恋者面临的新困境，作家们希望社会都能采取所谓“博爱”的态度，家人的理解、社会的关心对他们来说都是极为重要的。作家对同性恋人群的关注点随着时代的发展越来越深刻和前沿，他们的关注点不仅仅是在现实关怀层面，而且更深入到关怀同性恋者面对新困境时的精神层面。作家们在文本中体现出的博爱态度也是他们创作出优秀作品的关键。严歌苓的创作在这方面是极具代表性的。尽管我国在进入新世纪以后产生了不少同性恋题材的作品，但由于我国保守的政治文化国情，作家们能反映和进行描摹的领域是相当有限的，而作家严歌苓由于常年旅居海外，她的视野则相对开阔一些。经常出国的严歌苓惊异地发现：“美国同性恋很普遍，是爱情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她回忆道：“第一次看电影《蜘蛛女之吻》是在 1990 年，后来读了普微格的小说和自传，对同性恋的庄严、壮丽、尊严有了一个突破性的认识。读《蜘蛛女之吻》之后，我流了很久的眼泪，认识到这种不被传统认同的感情有着绝望的色彩和裂度，后来想到在歌舞团听到的一个女人的故事，非常扑朔迷离，就在 1997 年把它写成了《白蛇》。”^[46]这是作家严歌苓创作同性恋题材作品的开始，因为她意识到这种不被传统认同的感情有着绝望的色彩和裂度。作为一名心思细腻的女作家，怀揣着对这一人群理解、博爱的态度，加之后来在美国作者亲眼目睹以及接触到一些同性恋者，以及在美国旧金山宽松文化氛围的影响下，她又陆续创作出了《也是亚当，也是夏娃》、《学校中的故事》、《魔旦》等涉及到同性恋领域的新移民小说，在海内外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但值得注意的是，严歌苓在这一领域的创作是十分温和的，她没有像其他西方的先锋作家一样迫切地为同性恋者争取所谓的人权，而是从“爱”的角度出发，只是想去表达对这个特殊人群的关注和理解，对他们做为一个人给予最起码的尊重与爱，这与作者一向关注人性的创作意图是一致的。

作家们除了从“爱”的角度出发去关注同性恋者之外，还有一些书写深入到工业文明中都市人的生存状况中，揭示了当代人的现实与精神困境。香港作家智帆的《复活不复活是气旋》中的年轻主人公浩辉在发现自己与常人不一样时陷入了恐慌之中，而在他寻找出口试图解放自己的时候却惊讶的发现父亲和自己竟然是一样的人，这让青春期的浩辉更加的无助与迷茫。这篇作品向读者们展示了同性恋者在不得已组建了家庭之后的种种矛盾与纠结，儿子走上和父亲一样道路的原因引人深思。在文明的都市生活中，大家都是带上了面具生活，浩辉并不知道父亲是一个这样的人，在他的印象中父母连架都很少吵，一直以来他都觉得自己的家庭生活是比较幸福的。同性恋者在当代社会中无法摆脱父母们传统观念中要求的成家立业，便明知是错还组建了家庭，这与当代社会人们生活的普遍状态一样，他们困苦迷茫，却不知道如何去摆脱，直到做出了错误的决定。现实的困境无法走出，更加剧了他们精神困境的荒芜，只能以放纵自我来回答社会加在他们身上的束缚。在台湾作家洪凌的小说《玻璃子宫的诗》中，女同性恋者沙沙与通过人工授精生下的女儿水凌之间

无法消除的隔膜与误解，社会对这个女同性恋者生出的孩子的不宽容和不友善的待遇都被表现地淋漓尽致。台湾作家加里多的作品《妹妹晚安》讲述了同性恋者阿炫与妹妹衷安之间温暖的亲情，兄妹两人从小关系就很好，作为大哥的阿炫在父母遇难后的日子里精心照顾着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的小妹衷安，妹妹也十分理解大哥作为一名同性恋者的苦衷，兄妹二人与哥哥的同性爱人阿贡相互关爱，组成了一个温馨的家庭。最终妹妹的辞世让大哥痛不欲生，在与阿贡一同整理妹妹遗物的时候发现了妹妹留下的刻有给他们二人祝福的纹石印章，哥哥阿炫再也忍不住失声痛哭起来。这是一部充满温情的作品，得到亲情支持的同性恋者找到了生命的意义。以上的这几部作品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生活在工业文明和后工业文明中的同性恋者的生存状况，他们都或多或少的面对这样那样的问题，如社会环境的困扰、家庭氛围的影响，情感与人际关系之间相互的不信任等。但作者还是在关注他们精神困扰的同时给了他们希望，这也是作家们自身秉持着博爱主义的思想对未来社会寄予的厚望。

四、当代同性恋文学书写的意义

20 世纪的文学是多元化的，它吸纳了来自历史学、法学、医学、社会学等各个方面的新兴内容，仿佛一本百科全书，跨越各个学科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与创作，形成了海纳百川之势。中国当代文学由于其特定的时代背景，直到新时期以后才逐渐地与世界接轨，这个阶段大量的外来思潮、文化理论涌入我国，为作家们的思想解放带来了不小的影响，越来越多的学科体系都融入到了文学创作当中。同性恋最初是在社会学和心理学领域被较多研究，后来逐渐被文学家们所理解与创作。另外，文学创作是一个最富于创造性的多姿多彩的领域，因此类型、风格的多样与变化是文学应该拥有的品质之一。所以同性恋文学的书写大大丰富了当代文学史上文学作品的类型，突破了以异性恋书写为主的传统局面。同时还在一定意义上引领读者正确认识了同性恋现象，并通过对同性恋者比常人更为复杂的内心活动探索了人本身所面临的生存与情感困境。上述种种无不说明了当代同性恋文学书写具有较高的文学意义与现实意义。

1、对个体生存困境的探索

从以往的阅读经验来看，文学作品往往是通过描述一种社会现象来引起读者们与作者产生各方面的共鸣，因此文学也被归属为一种社会现象。其实真正打动人心的文学作品一般是关注人们内心情感的，这样创作出来的作品往往蕴含着更为深沉、丰富的生命意义。换句话说，情感是文学创作的重要源泉之一，人类的生存必定伴随着情感困境，因此情感的困境永远是人类生存与精神难以逾越的永恒主题，也是文学作品的重点表现对象。许多作家便抓住了这一带有旺盛生命力的表现领域，创作出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佳作。同性恋者所面对的世俗观念制约、伦理道德评判、自我身份认定等种种难题比异性恋者更为复杂，因此对于作家而言，这一人群因为传统观念与生存现实的压抑，形成了更为复杂的内心世

界，更难理清的情感状态，这些都成为了文学表达的富矿。所以当代作家对于同性恋生活的深入表现，对人性、情感的执着追问，不仅向人们展示了同性恋者的生活状态，更触及到人类个体存在的现实与精神困境。

在前文提到的作品中，台湾作家邱妙津的《鳄鱼手记》就极为深刻地描述了同性恋者在生存困境中对于人性与情感的多重思考。在这部获得 1995 年“时报文学奖推荐奖”的长篇小说中，同性恋者显得格外的痛苦与无助。首先，同性恋者本身就充满了罪恶感，他们怀疑自己是否正常，因为“正常”的性爱观念，即异性恋，对于他们来说已经是无法逾越和质疑的真理一样的存在。他们面对自己“鳄鱼”般异化的感情充满着疑惑和痛苦，但与此同时他们也在不断探索着这一感情状态存在的合理性，并努力寻找精神的出路，这无疑是困难的，最终他们只能以“自虐”的角色扮演让自己得到暂时的解脱。困境总是无法轻而易举逃脱的，在与“简单的性别符号”斗争无果之后，拉子和吞吞都试图回归到所谓“正常”的轨道上来，“穿着打扮女性化，言行举止散发出女性吸引异性的味道”，但“囚在内在本性的炼狱是无路可逃的”。拉子竭尽全力的改变终究还是没有达到想要的效果，她这种努力是徒劳的。这一点与小说的另一个一直未出场的主人公“鳄鱼”在人们眼中的生存状态是相同的，尽管大家都不愿意承认他们，但客观存在总是无法抹杀的。从她们对自己情感的最初的疑惑到试图改变的整个过程都反映出她们对自身情感的不停追问，她们的种种努力最终都以失败而告终，对自身的探索也没有给她们一个明确的答案，这无疑为读者们对这一问题的思考留下了相当大的空白区，作者试图以此来引发读者们对主人公情感方面的困境进行自己的阐释与解读。

值得注意的是，作品中一直未出现的神秘主角“鳄鱼”成为了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符号，与同性恋者形象遥相呼应。小说中写到：各种新闻节目、报纸对鳄鱼的报道让普通民众对这一神秘物种充满好奇又无比恐惧，“普通的人们认不出鳄鱼”、“大学生们是最冷淡的年龄层，他们变得疏远报纸和新闻节目，以免被认为和鳄鱼有关，因为民意调查中心说鳄鱼混进这个族群最多。”、“它很久没这么近地接近人类啰。”^[47]人们从发现了鳄鱼的存在开始，进而各种新闻媒体去关注、调查鳄鱼，最后对鳄鱼进行诱捕和杀害，都影射了当代社会在面对已经尝试走出来的同性恋者时，还是对他们进行了以社会舆论为代表的各种变相的攻击。这一明显的同性恋者的象征性称谓带给读者无限的想象空间，在小说后半部分鳄鱼们生存或是毁灭的命运一直牵动着读者们的心。在“鳄鱼月”的最后一天，鳄鱼寄出名叫“鳄鱼的遗言”的写真录影带，在里面它以真诚的语气告白，最后不禁委屈的问：“是不是我消失了，大家就会继续喜欢我？”录影带结尾是它坐在漂在大海上的木盆中自焚、漂向远方的场景，旁白则是：“贾曼说：‘我无话可说……祝你们幸福快乐’。”^[48]如果说作品的一部分是为了展示以“拉子”为代表的主人公们的情感困惑的话，那另一部分则是围绕着“鳄鱼”这个意象符号，它代表了同性恋这一特殊人群对自己在社会中所处的环境与地位的自我评价。“鳄鱼”们自身是渴望靠近人们正常的生活的，他们试图博取人类的接受与认可，然而主流社会却害怕“鳄鱼”对他们所谓“普通人”的同化与伤害，以种种方

式围剿他们，防止他们危害人类。在笔者看来，“鳄鱼”们不仅表达了自我生存在现实社会中所面临的困境，更是以最直接的方式对人性提出了深层的发问，人性中应该包含的平等与尊重在面临这一特殊人群的时候不复存在，对“鳄鱼”的捕杀实际上就是对同性恋者的无情逼迫与镇压，这在一定意义上揭示出了人性当中自私的一面，即在面临威胁到自身稳定生活的因素的时候，还是要去打压这些因素以保障自身生活的正常秩序与安全。由此可以看出，对同性恋这一现象的书写不仅关注于同性恋者自身，更是关注到了传统观念对人类的制约以及人性的本质，这不得不说是这一题材在其文学价值方面的一大新突破。同时，我们也能看到，正是对个体生存困境的探索中，当代同性恋文学的书写内容历经了发现、探索、困惑、迷茫、正视、自恋与现实困境这一过程而逐渐迈向成熟，这里的成熟是指作家们将这些表现对象看做是正常的人来对待，并非是强调他们的同性恋身份，而是赋予他们做为“人”的基本权利。最为明显的便是身份的变化，从刚开始未被大众所接受之时的“病态同性恋”到他们自己标榜的“酷儿”（queer），再到后来无需特指的和常人无异的身份，这也是同性恋书写的进步之处。

2、对异性恋书写传统的突围与开拓

同性恋文学书写与异性恋书写不同，它长期处于边缘化的位置，被主流文化所遮盖。尤其是在中国文学史中。不过，由于历史和文化的区别，在西方文学中，同性恋话语表达有着相对长久的历史，涌现出了相当数量的同性恋文本，这与西方特殊的历史文化语境是分不开的。西方文化是建立在古希腊和古罗马文明的基础之上的，这两种文明无疑都是认可同性恋文化的。古希腊著名的哲学家柏拉图在《会饮篇》中有这样一段话：“只有和男人在一起的少男才是最优秀的。因为他们的行为时处于勇敢、雄壮、刚阳，被同声同气的人吸引。……他们天性上就对娶妻、生养子女没有兴趣，要不是忌于法律，他们宁愿不要结婚，而与同类男人相守。”^[49]这段话证明了同性爱在那个时代的存在，并且同性恋者还得到了“只有和男人在一起的少男才是最优秀的”这样极高的赞誉。柏拉图甚至认为，人类生活方式的最高境界就是哲学加上同性间的爱恋。^[50]他曾经在《会饮篇》当中记载了阿尔喀比亚德与苏格拉底之间曾经发生的一段爱情故事，阿尔喀比亚德当着大家的面大方地表示他深爱着苏格拉底令人着迷的灵魂，并且曾经试图勾引过他，但最终被苏格拉底所拒绝。苏格拉底也说他很爱阿尔喀比亚德，但是两人的关系一旦扯到肉体的欲望上，那么他们的关系就只能结束了。现在看来，我们一直理解的“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最初是指存在于两个男性之间的爱情，这种爱情是很纯洁的，不涉及肉体方面的欲望。再如，据史料记载，古希腊的城邦底比斯对同性恋宽容接受甚至是鼓励的，当时的成年男子与少年可以以一种类似于婚姻的关系公开同居，这种行为也被百姓们认可。公元前 378 年，底比斯还创建了一支骁勇善战的军队，即底比斯“圣军”，它由 300 人（150 对）组成，士兵们是从底比斯的各个军团里面挑选出来的，挑选的标准是：同性恋、恋人关系、战斗力强悍。经过这三项条件，能选出 300 人，也反映出底比斯军队中的同性恋非常普及。由此可以看

出，西方文化的基石古希腊文化在历史上就视同性恋现象为正常，甚至对其是推崇的。那么，文学作品中对这一现象的描述就相对常见。古希腊作品《伊利亚特》中就涉及到相关内容，古罗马时期的诗人贺拉斯对同性恋也进行了大量描写。此后，但丁的《神曲》、薄伽丘的《十日谈》、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集》等都涉及到了对同性恋的描写。19 世纪美国诗人惠特曼的《草叶集》被誉为“美国最有影响的同性恋文本”，作家王尔德的《道连·格雷的画像》被认为是英国文学中以同性恋为主题的最早的严肃短篇小说。20 世纪美国生物学家艾尔弗雷德·金西的两部专著——《人类男性的性行为》(1948)和《人类女性的性行为》(1953)，为解读同性恋提供了一些理论依据和支撑。^[51]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加州大学的罗丽蒂斯教授又提出了现在被广泛接受的“酷儿理论”，在笔者看来，“酷儿”理论所要表达的不仅是对同性恋人群存在合理性的争取，更是为了对社会发展多样性的一种展示。与此同时，“酷儿”的存在也是一种态度，这种兼容并包的态度对文学创作也是尤为关键的。因此，这一运动中的概念和理论传播对文学创作打开了一片新视野，同时也为文学创作提供了异性恋所表达主题之外的新的更为广泛的表现领域。

与西方对同性恋现象书写的持续发展与进步不同，我国虽然也是在悠久文明伊始就有了同性恋现象的存在以及对同性恋现象的文学书写，但是由于我国的国情和历史情况，关于同性恋现象书写要少得多，虽然明代冯梦龙在短篇小说集《情史》当中的《情外类》当中选录了历朝历代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平民百姓的同性爱故事；此后又出现了讲述同性恋现象或故事的一批小说作品，如《龙阳逸史》、《弁而钗》、《红楼梦》、《金瓶梅》等；而作家李渔的剧本《笠翁十种曲·怜香伴》当中也描写了崔笏云和曹语花的女同性恋情节；此外，《品花宝鉴》也是以描写梨园界的同性恋为主题的。进入现代文学之后，五四时期是对同性恋现象进行了较为集中书写的一个阶段，新文化运动推动了个人意识的觉醒，周作人提出的“人的文学”得到了知识分子的关注与回应，出现了庐隐、郁达夫、凌淑华、石评梅等作家对这一现象的大胆表现。但由于当时毕竟只是文化开放的初期，因此该类型的小说在数量上还是相当有限的。此后更由于时代形式的变化，对这一现象的关注在文学中渐至停滞。

因此，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是，中国文学的情感书写一直都是异性恋话语的天下，同性恋文学书写只是在异性恋书写一统天下的平台当中扮演一个边缘性的角色。只有我们对此类书写进行了细致的梳理之后，才能发现它们的若隐如现、时断时续的身影，而这种边缘化的存在也在一定意义上形成了对异性恋书写独占文坛的一种突围与开拓。一般来说异性恋情感题材的情爱叙事似乎总是负责承载某种“正统性”的、合法性的价值，而负载与这些主流价值观念一致或者基本一致的经典文本，可称其为“正典”。这种正统性的经典文本一直贯穿于我国从古至今的文学史脉络之中，已经形成了所谓的主流文学，这对读者们的人生观、价值观都有着或多或少的影响。不仅如此，这种经典文本类型因为长期无变化而变得单一，使得文学创作变成了类型化创作，文学本身那种吸引读者的魅力在逐渐减

少。随着时代的进步与发展，对于整个中国文学史体系来说，多元的态势已经成为一种必需，以文本为中心，将社会现象与审美的需求都纳入到文学作品当中，才能称之为含义多元的文学。

由此可见，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在中国当代小说中出现的以林白、陈染、王小波、白先勇、邱妙津、朱天文、严歌苓等人的相关作品为代表的同性恋书写现象，无疑形成了对这种“正典”书写的补充，或者说，拓展了传统的异性恋书写一家独大的传统格局，促进了文学的多元化，无论是其文学意义还是其现实意义都是不可忽略的。这一再次闯入读者视野的文学和社会现象不仅为读者更好的领悟社会与人生起到了积极作用，对于作家自身而言，也给予了他们选择多样化创作动机和意图的机会。同性恋书写经历了发展和演变，在不同阶段、不同作家笔下会有不同的书写面貌，其实除了本身就是同性恋的作家以外，其他作家对同性恋现象的书写也是出于不同的写作意图的，如陈染、林白是从女性主义的角度出发，王小波等人又是以忠于文化和现实的态度来客观描述这一现象的存在，旅美作家严歌苓以及一些港台作家则是以亲身见闻来展示这一特殊人群的生存状态，以期得到人们的认可与理解。虽然不同阶段以及不同作家笔下的同性恋书写表现有所不同，但追求平等、尊严、公正是其不变的精神内核，作家的性别意识也不断修正，作家的人学观念也逐步完善，当代文学创作的题材和内涵也由此得到了丰富。

3、引领人们正确认识同性恋现象

同性恋文学书写不仅丰富了文学创作的内容和领域，打破了异性恋书写独占文坛的格局，丰富了文学创作的题材和内涵，而且这种书写还对引领人们正确认识同性恋现象起到了最为直接的现实意义。

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人们对于同性恋的认识都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在西方，由于基督教的存在，同性恋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被认为是罪恶的、变态的、违背正常伦理道德的。为了改变基督教给普通民众造成的这一错误观念和认识，西方的文学家们对同性恋现象进行了大量描写，并获得了不小的成就。作家薇拉·凯瑟 1905 年出版的短篇小说《保罗事件》获得普利策奖，该小说表达了一位女性作家对男同性恋所处困境的解读，作品生动地描述了男同性恋所面临的种种困境，但作者最终还是给这种悲观化情绪提供了一个出口，即无论如何还是有可能避免异化和自杀的。1948 年美国作家戈尔·维达尔发表了小说《城市与柱石》，讲述了主人公吉姆·威拉德从一名“恐同者”到主动去了解同性恋生活状态的心理变化经历，由此引导读者去了解这一人群。此小说反响热烈，成功地使读者对同性恋术语及其行为有了相应的了解，逐渐排除了“同性恋是病态”的这一错误观念。美国作家克里斯托夫·伊斯伍德于 1964 年创作的小说《单身男子》，堪称西方当代文坛上描述男同性恋的经典。该作品的主人公乔治是洛杉矶大学的一名教授，在同性恋人去世后就一直过着一种孤独寂寞的生活，最终因为觉得生活没有进行下去的意义而想到自杀。有学者认为，这部小说反思了灵与肉之间的矛盾，将维护个体的独特性和少数群体的意识视为

不可剥夺的政治和生活目标。2009 年该小说被改编成同名电影，获得三项金球奖提名和一次奥斯卡奖提名，这无疑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 21 世纪的人们对同性恋题材作品的一种认可。英国当代作家艾伦·霍林赫斯特本人是同性恋者，其同性恋长篇小说《美的轮廓》荣获 2004 年度“布克奖”，这是“布克奖”创立 36 年来第一次颁奖给该类小说。^[52]

在我国，同性恋现象在古代社会还是比较普遍的，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出现了“安陵君”和“信阳君”等著名的同性恋者，而汉代男同性恋更为风靡，到了魏晋南北朝，就出现了中国诗被认为是最早描写同性恋现象的诗歌——阮籍的《咏怀·十二》。明清时期同性恋现象及其文学创作又有了一定发展。由此可以看出，我国古代对于同性恋现象并不是完全排斥的，文学作品也有很多对此加以反映。但进入现代以后，受到抗战、文化大革命等各种政治因素的影响，加之中国人正统保守的思想观念和没有法律的保障，这些特殊的政治敏感度，造成了在五四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到 80 年代之前，艺术领域对同性恋的表现空间都是有限的，同性恋话语在创作中基本处于失语状态中。而这种状态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除了文学领域以外，无论是从伦理道德方面，还是医学与法律方面，80 年代之前的中国都是无法接受同性恋行为的，并且还对之加以排斥和打压。改革开放之后，随着时代的进步与发展，人们对同性恋的认识越来越清晰与开放，同性恋现象也在各方面得到了一定的认可与接受。1997 年，中国新《刑法》开始实行，与此前的《刑法》相比，删掉了针对同性恋者之间性关系的流氓罪，这在许多学者专家看来是中国对于同性恋者宽容度提高的一个标志性事件，此《刑法》的实施也意味着同性恋性行为不再会被追究法律责任。2000 年底通过，2001 年正式实施的《中国精神疾病分类和诊断标准》（第三版）修改了同性恋是病态的界定，认为同性恋和异性恋一样，并不异常。如果同性恋者自我感到“不和谐”，需要治疗，才被视为病态。这是我国在法律、医学方面首次给了同性恋者们一个正常的认可，这些都得益于我国政治文化环境的开放程度。随着这些客观因素的确定，文学界对这一现象的书写表现变得更为直接与大胆了，20 世纪 90 年代西方出现了新一代的同性恋运动——“酷儿”运动，这一运动的相关理论很快传入中国（罗丽蒂斯在创造“酷儿”（queer）这个词时说到过这样一段话：“我创造这个词的本意是希望用它来取代无差别的单一形容词男同性恋和女同性恋，以便将性的多重性放在它们各自的历史、物质和语境中去理解。”^[53]瓦特尼也这样评价道：“酷儿表达了这样一种立场：它欢迎和赞赏一副更宽广的性与社会多样性的图景中的差异。”^[54]由此看来，“酷儿”运动为人们打开了一片新视野，同时也为同性恋人群提供了表达其多样性、合理性的一种途径及方式。“酷儿”同时也意味着反抗，它既不愿意自己被归入到单纯的同性恋的行列，但也反对异性恋的霸权。同时，它对抗的还是一种被固化的情欲体制，它想彻底的颠覆传统观念中的性文化，将其发展为合理的和日常生活一样能够被人们自然而然的接受和认可的一种观念，使情欲不再有正常和变态之分、好坏高下之分），对当代中国社会正确认识同性恋现象起到了进一步的推动作用，当代中国文坛对这一领域的创作也随之在 20 世纪 90 年代之后形成“喧嚣之势”，不断突破主流文化的禁忌，以后现代的酷儿姿态表达着异质多元的主张。在具体的

创作中，作家严歌苓的小说《也是亚当，也是夏娃》、《学校中的故事》、《魔旦》以及香港同性恋短篇小说集《他她她的故事》等都以不同的方式引领人们关注这一群体的现实生存状况。这些作品为读者们打开了客观看待这个群体的一扇窗户，使我们和这个特殊的群体靠得更近，也开始逐渐接受他们存在的合理性。

由此看来，当代同性恋书写对人们了解、理解同性恋现象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这些文本修正了人们对于同性恋现象的认知，为现实生活中的同性恋提供一种人文关照，从根本上唤起了人们对于同性恋生活的理解和关注。特别是随着时代的进步与发展，当今社会中同性恋现象已经逐渐演化成了较为普遍的社会问题，同性恋者所面临的配偶、家庭、子女问题都波及到整个社会，在港台出版的中国第一本同性恋小说合集《他她她的故事》中就详细讲述了生活在当代社会中的同性恋所面临的一系列关乎亲情、爱情、友情的或多或少的困惑与矛盾，其中不乏周围人支持同性恋者的感人故事，也有尽管自己走出了自己的精神枷锁正视自己的性取向却无法得到家人与朋友的理解。因此如何正确处理与看待当下这个较为热门、敏感的话题，如何传达给读者们一个科学、公正、合理的态度，这些都成为了作家们在创作之时考虑的因素之一。另外，同性恋书写还充分展示了同性恋亚文化的独特之处，作为一直很难被主流文化接受和认可的亚文化，它有自身的局限性，然而它的存在在一定意义上与社会主流文化形成交错互动，成为社会主流文化的一面镜子，让人们对社会文化、人性、情感可以获得一种新的、更深度的观察和认知。

五、结语

当代文学中对于同性恋现象的书写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作家们跟随着时代的步伐对这一特殊人群从方方面面进行了关注，从陈染、林白等人站在女性主义立场上的同性爱书写到王小波笔下同性恋者尴尬的自我身份发现，从白先勇、朱天文笔下“孽子”、“荒人”们的困惑到崔子恩等人笔下的自我解放，从严歌苓笔下同性恋者难以摆脱的现实束缚到小说集《他她她的故事》中展示的生存困境，同性恋人群的生活以及精神状态一览无余地展现在了读者面前。通过梳理当代小说家笔下展现出的这些人物行为特征及其心理面貌，作家们的创作动因与文本所体现出来的文化内涵也引发了我们的深思：无论是女作家笔下表现的女同性爱对传统性别文化的反叛，亦或是同性性爱对传统性观念的颠覆，还是作家们在文本创作中对这一群体表现出来的人文关怀，这些都为读者对同性恋现象的思考带来一种全新的认识与思考的角度。另外，当代文学中的同性恋书写也别具一些文学意义和现实意义：这些作品对中国文学史上异性恋书写独霸文坛的传统形成了突围与开拓，同时也修正了人们对于同性恋现象的认知，为现实生活中的同性恋者提供一种人文关照，使他们能够更好地在当代社会中生活下去。

席勒在《审美教育书简》中提出：“艺术有映象生命的能力。只有把生命和形式统一起来，形成一种活的形象，一种生命的有机体，艺术才会有强烈的感染力。”^[55]同性恋文学书写就是一种具有映象生命能力的艺术形态，它展现给我们活生生的人物形象以及他们真

实的生活状态，因而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这种“非常态”却又无比真实的书写状态也许是同性恋文学最为成功的地方，也是其在文学史上值得继续深入研究的理由和价值所在。

参考文献：

- [1][2]李银河. 同性恋亚文化[M]. 北京: 今日中国出版社, 1998. 5、20.
- [3][4]林白. 猫的激情时代[M].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1. 148、152.
- [5] 陈顺馨. 中国当代叙事与性别·前言[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5. 136.
- [6][7]陈染. 私人生活[M].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4. 36、41.
- [8][9][10][11][12][13] 林白. 瓶中之水[M]. 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 2007. 58.
- [14]王小波. 王小波全集·第十卷 未竟稿[M].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6. 297.
- [15][16]白先勇. 孽子[M].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0. 13、43.
- [17]朱伟诚. 另类经典: 台湾同志文学(小说)史论[M]. 台北: 二鱼文化事业有限公司, 2005. 63.
- [18][19]朱天文. 荒人手记[M]. 山东: 山东画报出版社. 2009. 37.
- [20]陈思和. 凤凰·鳄鱼·吸血鬼——试论台湾文学创作中的几个同性恋意象 [J]. 南方论坛. 2001. (3).
- [21][22]崔子恩. 桃色嘴唇[M]. 广东: 珠海出版社. 2003. 23、29.
- [23][24]严歌苓. 也是亚当, 也是夏娃[M]. 北京: 中国华文出版社. 2000 . 27、35.
- [25]严歌苓. 也是亚当, 也是夏娃[M].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2010. 103.
- [26]许妮. “双面男女”的生存状态——中国同性恋者的半地下生存[J]. 中国社会导刊. 2006.
- [27]卢剑雄. 他她她的故事[M]. 香港: 华生书店. 1996. 137.
- [28]李银河. 同性恋亚文化[M]. 北京: 今日中国出版社, 1998. 5.
- [29] (英) 弗吉尼亚·伍尔夫著, 王还 译. 一间自己的屋子[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 [30]陈染: 《超性别意识与自我的创作》[A]. 张清华: 《中国新时期女性文学研究资料》[C]. 济南: 山东文艺出版社, 2006. 101.
- [31][53][54] (美) 葛尔·罗宾等著, 李银河译. 酷儿理论[M]. 北京: 时事出版社. 2000. 90、157、160.
- [32]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 人民出版社, 1960. 103.
- [33]李银河. 同性恋亚文化[M]. 北京: 今日中国出版社, 1998. 409.
- [34]王小波. 王小波全集[M]. 第八卷. 云南: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6. 203.
- [35]刘舒婷. 边缘身份者的权力诉求——浅析《东宫西宫》中同性恋文化与权力控制关系[J]. 文学界. 2010.
- [36] (法) 西蒙娜·德·波伏娃. 陶铁柱译. 第二性. [M]. 北京: 中国书籍出版社. 1998.
- [37]邱妙津. 鳄鱼手记[M]. 台湾: 印刻文学生活杂志出版有限公司. 2006. 69.
- [38]仲红卫、张进. 论清末民初文学公共领域的形成及特征. 兰州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

版. 2004.

[39] 王晋民. 白先勇传[M]. 香港: 华汉文化事业公司, 1992. 79.

[40] 白先勇. 孽子[M].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0. 7.

[41] 朱光潜. 文艺心理学[A]. 朱光潜全集(第一卷)[M]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1987. 314.

[42] 蔡克健. 访问白先勇[A]. 白先勇文集(第四卷)[M]. 广州: 花城出版社, 2000. 552—553.

[43] 白先勇文集(第五卷)[M]. 广州: 花城出版社, 2000. 389.

[44] 白先勇. 树犹如此[A]. 白先勇文集(第四卷)[M]. 广州: 花城出版社, 2000. 143.

[45] 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 李大钊全集(第三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6. 107.

[46] 芦泊. 《女作家严歌苓访问录》[A]. 华夏时报. 2002、5.

[47][48] 邱妙津. 鳄鱼手记[M]. 台湾: 印刻文学生活杂志出版有限公司. 2006. 196、213.

[49] 贾薇. 重释柏拉图式爱情[J]. 文教资料 2007、7.

[50] 余廷明. 西方伦理与同性恋现象[M]. 台湾: 东西文化事业公司. 2002. 15.

[51][52] 何昌邑、区林. 西方男同性恋文学书写和述评[J]. 云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1.

[55] (德) 席勒著, 张玉能译. 审美教育书简[M].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9. 276.

在校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1] 邢琼. 对客体距离的控制——评李昂《杀夫》中情绪修辞[J]. 语文学刊, 2011, (4). 53.
- [2] 邢琼. 无法回避的夹缝生存——浅析邱妙津《鳄鱼笔记》[J]. 安徽文学, 2012, (2). 155.
- [3] 邢琼. “文革”时代的浪漫想象——评苏童的新作《河岸》[J]. 西江月, 2012, (11). 2.

致谢

时光飞逝，转眼间我的研究生生活要结束了。毕业之际，内心涌动的是对过去的回忆和对未来的憧憬。

毕业论文的写作是一项巨大的工程，需要克服诸多考验。如今，我能顺利完成毕业论文，要感谢我的导师张文娟老师。张老师认真、耐心、负责，在我撰写论文的过程中，她总是抽出专门的时间和我讨论，把她对作家作品的认识告诉我，指导我寻找新的思路。而在修改论文时，老师在论文中做了密密麻麻仔细的批注，这些圈圈点点让我感受到了老师的辛苦和良苦用心。在生活中，老师给予了我无尽的关心和帮助，对她的感激之情难以用语言表达。借此机会，谨以“谢谢”表达我对老师无穷的谢意和感激，能够成为您的学生真的很幸运，我祈盼您将是我这一生的良师益友。

最后，感谢审阅本篇论文的各位答辩委员会的专家，感谢你们对我论文的指正。

邢琼

2013年4月